

诗经

「变风变雅」考论

刘冬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HIJING BIANFENG BIANYA KAOLUN

诗经

「变风变雅」考论

刘冬颖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变风变雅”考论/刘冬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04-5592-5

I. 诗… II. 刘… III. 诗经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2693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欣 然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195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冬颖在本科、硕士阶段是学中文的，师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傅道彬教授，专攻先秦文学，后来攻读博士学位，又随我学习先秦史。虽然文史不分家，两家所运用的文献也基本相通，但先秦文学和先秦史毕竟是两门学科，它们之间有一定距离。她为完成跨学科学习任务，需要花较多精力补课，提高史学素养，为此，她付出了“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毅力，按时完成了学业，并撰成这篇论文。在论文通过后经过两年的积淀和思考，再三修改，今天得以付梓。作为女性，可以想见，她所使用的辛劳劲头是不言而喻的。

《诗经》学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今天后学要攀登《诗经》学的前沿，走一条创新之路谈何容易？不过，从一部《诗经》学史来看，《诗经》学研究也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步伐，带来许多新话题，印上时代发展的烙印，它就像其他传统学科一样，同样存在着一个常学常新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作者以《〈诗经〉“变风变雅”考论》为选题，试图从史学角度来拓展《诗经》研究的视野，力求做到不仅关注它的文学美，而且还要发掘它的史学价值所在。

本书开篇提出了“以诗说史”这一命题，可能是为了区别《毛诗序》的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以诗证史”之弊，以历史意识，尽量从《诗经》中发现“史”的元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参照其他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用实证的方法，考实风雅“正变”产生的历史土壤，及其反映出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风貌，乃至当时人们的心态和情绪。当然，本书作者非常清楚“以诗说

史”的研究方法早已有之，从司马迁到近代学者郭沫若、孙作云等，他们都曾运用《诗经》资料论述西周、春秋社会的历史，写出了传世佳作，他们的研究方法早已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赞赏。本书作者正是在吸纳前人研究方法基础上而撰成是书的。

为选择“变风变雅”作为研究课题，作者首先要对与此相关联的《毛诗序》及其风雅“正变”说作一评判。此时恰当《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发表，冬颖就把视线集中到这一新发现的资料上来，并连续写了几篇相关文章，为撰写本书奠定了基础。她经过对《孔子诗论》和《毛诗序》的比较研究，发现内中存在某些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并提出“《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三百》的经典化渊源及解析‘正变’说的历史渊源都提供了有力证据。”本书还对《毛诗序》在中国经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对其风雅“正变”说在诗学理论上的贡献及其缺陷做了具体分析。以上这些观点正是本书选取“变风变雅”为题的基点。同时，本书还对“变大雅”和“变小雅”的若干篇章作了断代研究，这是“以诗说史”的必要前提，若不下这番功夫就不能达到“以诗说史”的目的。

本书用了三章篇幅来论述“变风变雅”与西周末、春秋社会的关系，尽量体现“史”的研究内涵，并发掘《诗经》的史学价值。众所周知，西周末到春秋社会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由于近三百年的西周文明的积淀，促使这一阶段生产力发生了飞跃发展，其标志之一是工商城市兴起，城市人口剧增，迎来了具有丰厚内涵的城邑文明。由于各地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加大了各地区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如出现了周秦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更为显明的变化是“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宗亲观念的变化乃至天命观的动摇，这都预示着新时代新气象的到来，这一切都反映在“变风变雅”的诗篇中。本书正是利用这些篇章，对“风雅正变”诗篇进行比

较，且参照其他文献和考古资料，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轨迹，实现了“以诗说史”的初衷。

总之，这是作者学习《诗经》的尝试，其初衷大概是想对文学和史学做一次嫁接，来恢复《诗经》研究的原初状态，为《诗经》研究园地栽上一株新苗，我愿它能逐渐长大成材。

詹子庆

2005年5月于长春

目 录

引言 文学的《诗》与史学的《诗》	(1)
一、《诗经》的史料价值	(1)
二、诗与史的关系	(4)
1. 《生民》与周族的源起	(10)
2. 《公刘》、《绵》与周民族大迁徙	(12)
3. 周朝的建立——《皇矣》、《大明》	(14)
4. 诗与史的距离	(16)
三、以《诗》说史的历史	(17)
(一) 传统的以《诗》说史的历史	(18)
1. 孟子的《诗》学观念	(18)
2.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与《诗经》	(20)
3. 古文《毛诗》解《诗》的历史化倾向	(22)
4. 清人的《诗经》史学研究成果	(24)
(二) 近人以《诗》说史的贡献	(26)
1. “古史辨”派对《诗经》的历史考察	(26)
2.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以《诗》说史”的影响	(27)
(三) 1949年以后以《诗》说史的成果	(29)
第一章 “正变”说：毛《序》的释《诗》方式	(31)
一、“正变”说的提出	(32)
二、“变风变雅”诗篇断代考	(37)
1. 变《大雅》的创作年代	(42)
2. 变《小雅》的创作年代	(48)

3. 变《风》的创作年代	(54)
三、“正变”说辨正	(62)
1. “正变”说的贡献	(62)
2. “正变”说的缺陷	(64)
第二章 从出土文献看“正变”说的历史渊源	(70)
一、先秦的用《诗》风气与孔子的解《诗》方式	(72)
1. 《诗》的音乐性的消失	(72)
2. 用《诗》风气之盛	(76)
3. 孔子与《诗》的关系	(81)
二、《孔子论诗》与《毛诗序》解诗	(87)
1. 汉儒的解《诗》方式	(90)
2. “诗可以怨”与“美刺”言诗	(98)
3. 《毛诗序》历史地位的再评价	(104)
第三章 “风雅正变”与礼乐文明	(108)
一、“变风变雅”与“礼崩乐坏”	(109)
二、雅诗“正变”与天命观念的嬗变	(115)
1. “正雅”中的天、帝	(116)
2. “变雅”中“天命”观念的变化	(121)
三、“风雅正变”与音乐观念的变化	(127)
1. “正”诗与“雅乐”	(129)
2. “变风变雅”与新乐流行	(134)
四、“风雅正变”的精神实质	(138)
1. “安以乐”的“正风正雅”传统	(139)
2. “怨以怒”的“变风变雅”风貌	(143)
第四章 《风》诗“正变”的地域特征	(152)
一、“二南”	(155)
二、通论十三《国风》	(162)
(一) 卫地与卫诗	(163)

(二) 平王东迁与《王风》	(167)
(三) 郑地与《郑风》	(169)
(四) 齐地与《齐风》	(174)
(五) 魏、唐之音	(178)
1. 唐地与《唐风》考	(178)
2. 《魏风》与魏国	(181)
(六) 陈、桧、曹三风	(183)
1. 陈地风俗与《陈风》	(183)
2. 桧地与《桧风》	(185)
3. 曹国与《曹风》	(187)
(七) 豳、秦之风	(189)
1. 豳地与《豳风》	(189)
2. 秦地与《秦风》	(190)
第五章 “变风变雅”与春秋时代的城邑文明	(194)
一、城市的繁荣与《诗》的繁荣	(194)
1. 《诗》中所见的城市历史	(195)
2. 城市的繁荣与《诗》	(199)
二、“变风变雅”诗篇对春秋城市生活的还原	(203)
1. 《诗》中之“国”	(204)
2. 说“国人”	(208)
3. 衣饰风度	(212)
三、“君子”、“淑女”与《国风》作者身份辨	(216)
参考书目	(231)
后 记	(240)

引言 文学的《诗》与史学的《诗》

因为年代久远，中国先秦史始终蒙着一层面纱。尽管近年来地下考古出土文物颇多，可相对于我们想了解的当时社会状况来说却是少而又少。在先秦的典籍中，《诗经》是可信度较高的一个。可长期以来，人们仅仅关注它作为文学作品的美，而忽略了其史学价值。明代的王阳明就曾说过：“五经亦只是史”，^① 主张把包括《诗经》在内的五经当作史料来看；清代的章学诚更是提出“六经皆史”论，^② 强调以史学研究方法来解读儒家经典。

一、《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一直被称作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篇亮点，其实，“文学”二字是后人加给它的。在《诗》还未被圣化为“经”的三百篇产生之初，尚没有这样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诗百科全书地涵盖着精神文化现象。闻一多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③ 《诗经》所记录的宗教祭祀活动、田间地头的劳作和宴饮酬酢中所见的宗法等级关系等等，都在诗的美好节律中向我们透露着那个时代的信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页。

③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2页。

息。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诗经》都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它不但是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藪。《诗经》的史料价值在于：

首先，《诗经》中的史料，较之其他古籍要真实可靠。它虽然也有脱简错简之处，但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最可贵的是其中很少后人的伪作。梁启超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揉，几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①《诗经》记载史实的可靠性，最突出的例子是《小雅·十月之交》。诗中记有两件史事，即“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和“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举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②现代天文学家和地震学家根据诗中所说进行推算，断定前者是记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 776 年的一次日食；后者是记比这早四年，即公元前 780 年的一次大地震。^③

其次，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诗经》比先秦其他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诗的特点，在于组织严密，字有定数，章有定句，所以很不容易窜改；又因为有韵，便于记忆，得以更完整地流传。《汉书·艺文志》说：“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和《诗经·周颂》同时代的《尚书·周书》，诘屈聱牙、晦涩难懂，而《周颂》却朗朗上口，悦人心目。《诗经》和《尚书》是同时代的，二者都经过秦火，《尚书》损伤很大，而《诗经》却依靠记诵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九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69 页。

② 本书中所引《诗经》中的文字皆出自于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下则不注。

③ 转引自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53 页。

周之盛，至幽、厉之缺”，这说明孔子在删述《诗三百》时已注意到史的线索，力图全面反映殷周王道政治的盛衰过程。《诗经》中所记载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既有追记前代的，也有记录当代的。“雅”、“颂”部分，大都追记前代，是那个时候的前代史；而“风”的部分，《礼记·王制》已有“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也有：“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风》诗记录了民间讽刺王政得失，也记录了人们对当时政治措施的反映，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当代史。

学《诗》不仅能见其美，还可以从中考察到当时的社会面貌。首先，《诗经》中有一批史诗。汉民族史诗虽不像其他民族史诗那样以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见长，却以单篇的有重点的形式叙述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如周民族的史诗有《大雅·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这些诗较全面地记述了周族起源、迁徙、发展、壮大、鼎盛的历史，虽然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史诗有别，却基本上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可以说是史诗的雏形。它们从题材、主题，到内容、形式都相类似。如果我们按照这些诗篇所反映的时间先后顺序，把它们贯穿起来，加在一起连读，就仿佛一部比较完整的周族发展历史。它们描绘了从周族始祖后稷开始，历经几代英雄祖先，如何领导周族，一再迁徙，开拓疆土，艰苦创业，发展壮大；直到文王崛起，励精图治；武王伐纣，建立周朝等一系列令人惊心动魄、目不暇接的历史画卷。因而，它们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文献史料价值；《商颂·玄鸟》、《长发》等诗篇也记述了商人的民族史。其次，“有些诗篇反映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大雅·江汉》、《常武》二诗写周宣王平定淮夷的战争；《小雅·采薇》、《出车》、《六月》写宣王讨伐玁狁；《小雅·采芣》写周王朝大将方叔南征荆蛮，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宣王中兴的

大致情景”。^①又如《小雅·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大雅·板》、《荡》、《桑柔》等诗篇尖锐批评时政，从中可见幽厉时期天怒人怨、民愤鼎沸的情景，可以与《国语·周语上》的《邵公谏厉王弭谤》、《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制》等篇互相参证，是研究西周末年极为珍贵的史料。历代的史学家治史，常以这些诗中的字句作为论证的材料。第三，《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对研究两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及政治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这条记载介绍了《诗经·秦风·黄鸟》的具体创作契机，告诉我们春秋时期在秦地仍遗存着“人殉”的落后丧葬习俗，这种习俗在春秋时期已经不被人们接受了。又据《左传·闵公二年》载：公元前660年，狄人灭卫，卫君懿公战败被杀。“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邶风·载驰》诗云：“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从诗意推测，《载驰》是许穆夫人派遣使臣归唁卫侯失国、在使臣出发后创作的。这样《载驰》又与公元前660年狄人灭卫这一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后，《左传》同一年又记载了文公迁楚丘一事，《邶风·定之方中》一诗记录了卫国人民在灭国后重建家园的史实。春秋时期兼并战争不断、大国吞并小国的社会现实由此可见一斑。

二、诗与史的关系

《孟子·离娄下》记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后《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何以能代《诗》而兴？因为《诗》

^① 陈桐生：《史记与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也是一种《春秋》。“原本《诗》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①

关于诗与史的关系，钱钟书先生分析道：

诗者，文之一体，而其用则不胜数。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记事传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然诗体而具纪事作用，谓古史即诗，史之本质即是诗，亦何不可。^②

既然史是由诗演化而来的，那么古人为何不说“诗言史”，而要说“诗言志”呢？

《尚书·尧典》最早称“诗言志”：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胥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一部典章文献和部分追叙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传为孔子所编成。此书西汉初存 28 篇，传为伏生口授，被称为《今文尚书》；另有《古文尚书》，传为汉武帝末年，由鲁恭王从孔子宅壁中发现，已佚。《今文尚书·尧典》虽非尧舜时人所作，但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用儒家思想陆续补订而成（孔子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因此，

① 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87 页。

②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8 页。

其中所言及的“诗言志”思想，当可看作是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以远人们对诗歌认识的简明概括。^①

《庄子·天下》篇亦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荀子·儒效》篇也称“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礼记·乐记》亦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从中可知“诗言志”的观念产生得很早。《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的一则记载，十分具体地记载了“诗以言志”的过程：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貺，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战！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① 孙家富：《先秦两汉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一方是赋诗言志，一方是听诗观志，这就是赵文子说的“诗以言志”所包括的两方面内容。可见，“志”（志，记载、志向）指的并不是诗歌创作者之志，而是赋诗者之志。那么，“诗言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前辈名家对“志”有诸多考证，汉人赵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注说“志”即“心所念虑”；郑玄在《礼记·学记》注中说“志”即“心意所趣向”；今人杨树达在《释诗》中说“志”从心，止声，意谓“志”即“心”；闻一多在《歌与诗》里，则说：“志字从止，卜辞‘止’作止，从止下一，像人足停在土地上，所以‘止’本训停止……志从止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亦可谓藏在心里。”^①所以《荀子·解蔽》曰：“志者，臧（藏）也。”《礼记·哀公问》篇有：“子志之于心也。”《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微申公子亹”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这里，“志”皆训为记。闻一多总结说：“一切记载既皆谓之志，而韵文产生又必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语）的了。”^②前贤对“志”的上述考证与解说是正确而有见地的，因为“志”确实是人类一种特有的心理现象，是意识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在最早的诗歌理论“诗言志”中，诗与历史记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的诗与我们今天关于“诗”的概念大不相同，它是一种综合文化现象，包含着多种职能。

当然，《诗》首先是文学的。但是因为它终究不能脱离产生它的时代，所以它又是历史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诸多方面。历史中的许多细节，都在《诗》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中体现出来。与纯粹的历史记述不同的是，《诗》中散落的是

① 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5 页。

② 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85 页。

历史的断章残片。然而，若参考当时其他文献，并利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不断出土的地下考古资料相佐证，这些散落的历史现象，也可连缀成篇，当时的社会生活原貌就能一点点凸现出来。如，雅、颂中的许多诗篇，都不仅传达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文化的道德实质，而且活生生地展现了它的外在形式，为我们保留下了礼的动态原貌。《大雅·行苇》第三章所写的“序宾以贤”诸程序，与《礼记·射义》、《仪礼·乡射》所记大体一致，现对比如下：

《大雅·行苇》——

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
 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或献或酢，洗爵奠罍。
 醢醢以荐，或燔或炙。嘉肴脾臠，或歌或詈。
 敦弓既坚，四鍤既钩，舍矢既均，序宾以贤。
 敦弓既句，既挟四鍤。四鍤如树，序宾以不侮。
 曾孙维主，酒醴维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
 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介景福。

《礼记·射义》——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

故《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